

票号致命的资本洁癖（晋商真相之续篇）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[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\\_ti2020/288/2021\\_2022\\_\\_E7\\_A5\\_A8\\_E5\\_8F\\_B7\\_E8\\_87\\_B4\\_E5\\_c123\\_288178.htm](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8/2021_2022__E7_A5_A8_E5_8F_B7_E8_87_B4_E5_c123_288178.htm) 山西票号和同样疲惫不堪的清王朝一样，似乎只需要一次维新变法，就可以重振雄风。历史的确曾经把“维新变法”的机会，摆在了山西票号面前。然而，在稍纵即逝的天赐良机面前，他们以和满清政府相似的思维、雷同的理由、同样的武断和固执，将“维新变法”扼杀在摇篮之中。这种悲剧的根源，就在于山西票号对于资本的致命洁癖，对于独占权力的病态痴迷。终结票号辉煌的，是银行。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办银行设想的，是太平天国的干王、写《资政新篇》的洪仁，那是1859年。山西票号在当时，不知道或者不认同开银行的主张，没能够“先知先觉”，确实情有可原。可是，在此后的几十年里，洋务运动、维新变法一浪一浪风起云涌，山西票号的东家和大掌柜们，仍然浑然不觉，就相当地说不过去了。容闳、郑观应、汪康年、盛京将军依克唐阿、唐廷枢、李鸿章、马建忠这些当时著名的洋务派人物，都曾经建议、甚至着手做过开办银行的努力。真正推动了第一家银行创立的，是盛宣怀。1896年，盛宣怀向朝廷上了“请设银行片”，认为“非急设中国银行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，杜洋商之挟持”。1897年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，到1911年，已经有30家银行，而在此期间，票号毫无动作，坐以待毙。尤其是户部银行成立以后，作为清政府的官办银行，它当仁不让地垄断了几乎全部的官款汇兑业务，这对于一靠官款汇兑赚手续费、二靠官款汇兑的现金流放贷的山西票号来讲，无疑是沉重的打击。山西

票号这块招牌，当年还是挺亮的。盛宣怀开办中国通商银行时，就曾说“平遥有一巨手”，极力聘请他来。如果这人实在请不来，也再三托人找山西票号中的高手。“如此人不能来，弟亦决定要用西帮（山西票号），但访求殊不易得。公于都中各西号多熟识，望再费神代为切而求之。”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时，想成立天津官银号（也就是后来的直隶银行），请山西票号入股，票号没理睬；户部银行（即后来票号最大的对手大清银行），主动挨家挨户敦促票号入股，票号也不干。为什么不干？晋商的这些东家和大掌柜们，希望永远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，惟我独尊，一旦引入外资，而且是强大的官方或者外商资本，必将受到牵制。原本丰厚的盈利可以自己独享，现在也被迫与人分享。关起门来做大王，这正是票号总部那些深宅大院的建筑文化，也是日后阎锡山统治山西的战略。正是这种“不容任何外人染指参与”的资本洁癖，使得山西票号错过了一次次天赐良机。“山西人办事虽稳，而性情拘执，且不能和衷共济，力顾大局。”“晋商各号，情势涣散，向来各做各生意，断不能联为一气。”当时的有识之士，已经看清了票号的这一不治之症。改革都是逼出来的。山西总部的东家和大掌柜，还沉醉在繁华梦中之时，在前线的将士们，已经在战火中看清了局势的危急，1908年，他们发起了一次筹组银行的维新变法运动。山西票号这次维新变法的主张，是为了应对当时盛宣怀的中国通商银行、朝廷的户部银行（即大清银行）、外资银行，以及交通银行、四明商业银行等的竞争，各大票号联合出资成立一家大银行，拟定了晋省汇业银行的名号。按计划，各票号集股五百万两，每个月收千分之四的股息。以当时票号极盛

时期的实力，各家集股五百万两，并不困难。这次票号维新的主要倡导者，是蔚丰厚票号的北京经理李宏龄，他们推举渠本翘为成立后的晋省汇业银行领袖。渠是晋商中为数不多的读书人，真正考出来的进士，有身份、有学识；当过驻外国领事，有眼界；领导山西赎矿运动，有威望；又创办了山西第一家近代民族工业“双福火柴公司”，有资历。这一维新变法曾经徘徊在成功的边缘。1903年，清政府就颁布了《奖励华商公司章程》20条，规定官商绅民投资兴办公司，凡能集股50万以上者，按集股数额的多少，给予不同的奖赏；1904年，颁布《试办银行章程》，对银行设立经营的方方面面作了规定，大多是仿照西方银行的榜样；1906年，又颁布《奖给商勋章程》。这就是说，成立股份制银行，并不是什么异想天开的创新之举，而是当时“响应国家号召”、“贯彻中央精神”的时髦举动。媒体也纷纷为这一举动造势，认为可以使“他族（外国）银行顿失其利。此不独晋人之愿，又岂非我全国人之所愿哉。”当时，各地分号的经理全部向山西总部请命，认为“时不可失，机会难再，宜早不宜缓也，宜速不宜迟也。”这些在前线打拼的票号中坚力量，最深切地感受到时局的变化，对于变法一事，群情振奋。如果李宏龄等人的设想得以实现，还将使票号的东家们免于几年之后的破产。山西票号一直实行无限责任制。票号出现亏损、倒闭，东家要用自己的全副身家来赔偿。某报纸就以此动员票号，“一旦有事，祸出不测，各码头同时败坏，大局莫支，各省官绅富商均向号东索取存款，此数年后必有之事。是票号与东家关系甚大，办银行与东家绝无后患也然而，票号实行的是总经理负责制，东家不可以过问票号的事务，这

种“东掌关系”直到今天仍然被一些糊涂人津津乐道。当时蔚泰厚的总经理，是在票号界举足轻重的毛鸿瀚。他的心态，与慈禧等人在戊戌变法中的心态，如出一辙。他既认识到竞争变化的威胁，又不能下定决心改弦更张，更对推动改革的李宏龄心怀猜忌。最终，毛鸿瀚做出了断送整个山西票号业前途的决定：“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，如各埠再来函劝，毋庸审议，迳束高阁可也。”他认定，李宏龄的上下奔走，正是为了夺他的权，企图成为山西票号业的首领，必须粉碎李宏龄的“夺权阴谋”。在这场票号业的维新变法中，其他票号的东家、大掌柜的态度，没有更多的史料记载。从一些蛛丝马迹判断，他们的心态和毛鸿瀚类似：一旦票号的资本上联手合作，成立银行，尽管有诸多好处，但有一项无法忍受的“缺点”他们将从此失去往日对票号的绝对控制权。侥幸心理和鼠目寸光，让他们扼杀了这场维新变法。万般无奈之中，李宏龄曾苦劝在山西深宅大院里的东家掌柜们出来“走一走”，他的急信中写道：“方今时局，日新一日，情形迥非昔比。方今学界官界，皆派人出洋考察，惟商界并无此举，而京城、天津、上海、汉口数处不可不往。火车、火船往来甚便，亦不甚辛苦，不过往返数日，细思有利无弊。”然而，曾经让山西票号迅速崛起的中央集权、自闭高压的“黑社会化”管理，使得下属的“串联”被迅速镇压。辛亥革命后回到乡下开杂货铺为生的李宏龄，将筹组银行流产前后的信件反复研究后，哀叹晋商之败并非“天数”，其实乃是“人事”之祸。100年后，仍然有人将山西票号的败落，归咎于时代的不幸，李宏龄九泉有知，必定再次心寒不已。

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

